

I706.7
306

八十年代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文学史的 多重面孔

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

杨庆祥等 著 程光炜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八十年代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文学史的多重面孔

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

Wenxueshi de
Duo chong Mian kong

杨庆祥等 著 程光炜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杨庆祥等著;程光炜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八十年代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5753-4

I. 文… II. ①杨…②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145 号

书 名: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

主 编:杨庆祥等 著 程光炜 编

责任编辑:张雅秋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753-4/I·215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3.25 印张 191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面的话

自 2005 年底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博士生开设了一门叫做“重返 80 年代”的讨论课。它的目的,是想调整单纯“课堂讲授”的生硬形式,通过讨论,让博士生直接参与到研究 80 年代文学的工作中来。

但是我注意到,关于 80 年代文学的认识、评价和结论,已经被固定在大量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论文之中,很多后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从那里面“拿来”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所谓的“历史”是必须先被“固定”下来,才成其为“历史”的,否则后面的人们都无法与之对话。但这样的结果,也会造成把那一代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对文学史的看法,强加在今天的研究者身上,让他们以为这就是自己所发现的“80 年代文学”。我们会以为,二十多年前的文学是一成不变的,尽管今天的历史语境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80 年代文学”却是纹丝不动的,我们的生活观、文学观,不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定型的吗?

“80 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在“改革开放”这一个“认识装置”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由此影响到对过去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的“重评”,如“浩然重评”、“文革文学重评”等;与此同时,被看做“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80 年代”,例如“人的文学”、“感情”、“审美”、“人道主义”、“文学遗产”等等。怀疑、否定、回收的过程,也就是“80 年代文学”之兴起的过 程。在这个意义上,“80 年代文学”被看做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断裂”,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然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权威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另外,1985 年还被看做是“80 年代文学”

的又一个分界点。又例如,与1985年前文学相配套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因为对新时期历史叙述的积极参与,所以被认为是“国家文学”的一部分;1985年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先锋话剧”、“第三代诗歌”和“新写实小说”等取代“伤痕文学”等而占据“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地盘,成为“主流文学”,于是这时候的文学被认为是真正到了“自由”、“自觉”和“文学自主性”的时代。1985年后的“80年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很多人都相信,促使“80年代文学”发生深刻转型和变革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文学的“去政治化”,另一个是“纯文学”的提倡。久而久之,以上“80年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它的高度“共识”和“成规”就密布在研究者的周边,既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根据,同时也对进一步的研究造成巨大的障碍。

必须承认,历史认识的获得,往往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摸索、认识“80年代文学”的过程同样也会如此。这种历史认识和感情,应该受到后来研究者的尊重。对“80年代文学”的重新研究,正是从这个“尊重”的起点上开始的。对我来说,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双重角色,在我写文章以及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它们一直纠缠着我,疑惑、清醒、矛盾、冲突时常产生。而对参加这一讨论的同学们来说,他们大多数是“80后”博士生,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和“问题化”。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清晰、有力和不容分说的“知识”多少带上一点点“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单刀直入和直接攻取的阻力和难度。之所以会在一次次讨论中出现争论,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在大学教学大纲中变成“文学场域”的“80年代文学”。在它的“文学知识”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冒犯”的学科危险,被目为“奇谈怪论”的可能性,一直在研究工作中存在。这就需要我们既在本学科的“想象共同体”内设计问题,探讨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应把这一“共同体”作为自己讨论的对象。但是,其中的分寸怎么把握,问题的讨论是否每次都具有有效性,是否有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没有答案,需要观察一个时

期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这套丛书共包括三种。《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是本丛书主编程光炜的个人著作。《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中的文章，出自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之手，他们的慷慨支持，大大扩充了这套丛书的学术含量。承蒙《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南师大学报》以及《新华文摘》等杂志的支持，《文学史的多重面孔》一书中的多数文章，已在上面发表。

本丛书的设想在 2007 年春天即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雅秋博士提出，经过和她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下来。由于她的理解和辛勤工作，丛书被列入出版计划并得以问世一直比较顺畅。另外，我的博士生陈华积和硕士生虞金星参加了二稿的校对。在此向各位老师和同学一并表示感谢。

程光炜

2008 年 1 月 14 于北京森林大第

目 录

前面的话 程光炜(1)

文学史视野

如何理解“80年代文学” 杨庆祥(3)

“文本”与“人”的歧途

——“新批评”与80年代“文学本体论” 黄 平(14)

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

——再谈“重写文学史” 杨庆祥(28)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

——以《今天》杂志为讨论对象 黄 平(47)

再造“新人”

——“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化及其影响 黄 平(65)

再识经典

“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文化语境 钱振文(85)

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 李建立(99)

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

——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 杨庆祥(118)

“私人情感”与“道义承担”之间的裂隙

——由遇罗锦的“童话”看“新时期”

之初作家身份及其功能 白 亮(137)

《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

——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 杨庆祥(157)

文学史对苏童的不同命名	刘洪霞 (175)
历史的浮标	
——“新时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研究	任南南 (187)

文学史视野

杨庆祥：如何理解“80年代文学”

黄 平：“文本”与“人”的歧途

——“新批评”与80年代“文学本体论”

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

——再谈“重写文学史”

黄 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

——以《今天》杂志为讨论对象

黄 平：再造“新人”

——“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化及其影响

如何理解“80年代文学”

杨庆祥

【事件回放】“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改革步伐的推进,文学开始进入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79到1989年大约十年的时间内,文学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形式和阅读对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一度成为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想象世界和人生的方式。与此相伴随的还有美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和文艺大复兴的“黄金时代”。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商品化和资本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新一轮调整和重组,思想文化界开始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对80年代进行重新的理解和反思。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究竟如何来理解、评价和书写80年代文化(文学)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2006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旅美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在读书界掀起一股“80年代文化热”。随后包括搜狐在内的多家大众媒体跟进这一潮流,在此潮流中,80年代的文学、电影、艺术和哲学等等重新成为一种怀旧式的话题,“80年代文化”变成了一个经过想象和包装的“大众消费品”。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学术界更早就开始对80年代进行更系统的、严肃的、具有学理意义的冷静研究。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和北京大学教授李杨分别在其所任教的大学开设“80年代文学研究”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并与《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多家学术期刊合作,采用理论导入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80年代文学事件、文学期刊、文学论争、文学经典的深入清理,试图把80年代文学纳入一种更加历史化、

知识化的学术生产之中。两年来,已经陆续刊发一批研究成果,引起学界瞩目。目前相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

一 “新时期文学”和 80 年代文学

学术界对于 80 年代发生在中国内地的文学一般用两个概念来指称,一个是“新时期文学”,一个是“80 年代文学”。在很多的文学史著作中,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可以置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它们之间非常细微但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区别。如果我们考察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 80 年代,“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使用频率比较高,如《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 版)、《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 版)等等。虽然在 1986 年有学者对“新时期文学”提出了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的对象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和“方向”,而不是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到了 90 年代,一部分学者又提出了“后新时期”的概念,同时关于“新时期文学终结”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在一些人看来,“新时期文学已经到了该保存自己”^①的时候了。虽然“终结”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但是“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自此以后却降低了很多,比如 90 年代末以来出版的几部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中,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已经不再使用“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了,而代之以“80 年代文学”。又比如近年来学界比较热闹的“重返”研究中,使用的基本上是“重返 80 年代文学”的说法,而很少使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说法。由此可见,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对这一段文学的认识和界定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由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和生成比较复杂,目前对这种变化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甚至有比较大的分歧和争论,比如南京的一些学者和北京的一些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就非常不一致。但是不管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

^① 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 年第 3 期。

何种意识形态纠纷和学术利益的分割,作为一种越来越“历史化”的80年代文学研究,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更加有效的甄别。

“新时期”本来是一个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说法,因为这一“命名”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与“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阶段(严格来说是“文革”时期)的断裂,所以很快成为一个普及性的名词,被转喻为各种意义上的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关的概念。“新时期文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1979年,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至此,周扬以官方权威发言人的身份,正式确认了新时期的提法,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分期概念”^①。同时,周扬在报告中还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六大方面的阐释,而在邓小平的“祝辞”中,也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标准和写作任务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规定”。^②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预设”的概念,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学史认定方式,因为一般来说,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史的叙述,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到的。而在该时期的文学发生之始就对其作出种种的“预设”,可能是出于主流意识形态意欲对文学进行“规划”和“领导”的原因。如果套用哲学上的术语,我们可以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演绎性”的概念,即根据意识形态的预设对文学的发展生成进行一种话语上的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外在于“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还在“新时期文学”演绎的范围之内,那么,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现象和思潮就彻底突破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预设,甚至是走到了它的反面,而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在1985年后的兴起更是严重偏离了“新时期文学”

^① 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收入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第15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的预定轨道。因此，“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和内涵与这一段文学的实际历史之间存在着名不符实的情况，我们充其量只能将“新时期文学”理解为对这一段文学的一种话语叙述类型，这种话语叙述作为文学史叙述之一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它实际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排他性的叙述方式，结果就删减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相对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80年代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后设的”、“归纳性”的概念。它在表述上比较“中性”，没有“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官方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本来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80年代文学”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趣味性”和“精英意识”的文学史表述，“80年代文学”被描述为“纯文学”生成和展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高尚趣味”也被确立起来。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是发生在2001年左右的关于“纯文学”的论争，吴亮对于“纯文学”略带偏执性的理解实际上有把“80年代文学”本质化的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把“80年代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张力和多种面向。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倾向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一些著作和媒体的推动下，“80年代”包括“80年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带有“怀旧”气息的“大众消费品”。其中最代表的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网络媒体搜狐的“搜狐读书：重访8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吴亮、查建英等人所谈论的“80年代文学”是“成功者”对于曾经经历过的一段历史的“归纳总结”，因此它总是竭力维护着对于自我叙述有利的“历史和经验”。虽然在这种讲述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面貌”，比如查建英的访谈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丰富的历史细节。但是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这种“怀旧”和“消费”式的处理历史的方式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胜利者确实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感；而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①历史固然是诸多

^① [英] 汤因比、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王少如、沈晓红译，第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个体搏斗挣扎的过程,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个体的经验放置到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去观察、思考,这种历史研究可能就是失败的。因此对于80年代文学而言,仅仅是去“认同式地”重新温习那些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人物、事件是没有多少生产性的,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去重新讨论这些已经成为“定论”的事物,发掘它们内蕴的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历史可能性”。比如对余华小说的研究,虽然一些文学史都提到了他的小说受到了侦探小说的影响,但是却没有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侦探小说的各种因素是如何进入了“先锋小说”的文本,并如何改写了“先锋小说”的文本特征和阅读效果,进而,在80年代,“先锋小说”究竟整合了多少文学资源来为其“先锋性”和“实验性”服务?又比如,王安忆的“三恋”中的“性描写”与当时的出版业、读者群体、社会的“性观念”之间有何种隐秘关联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或许可以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类型(如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寻根”、“先锋”)以及各种文学事件之间的复杂历史联系。

或许,究竟使用“新时期文学”还是“80年代文学”的概念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观念和问题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我们把“当下”和“80年代”对接起来,重新激活研究的活力。

二 “去政治化”和“文学的自主性”

如果把80年代文学理解为一个文学不断与政治松绑,最后回到所谓“文学自身”的过程,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与此前的“政治化”过程(“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形成的鲜明对比强化了“文学自主”的观念,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述。无论是把80年代的文学理解为“一体化走向解体的过程”还是“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都容易造成一种单一的理解,即,80年代文学是在拒绝“政治”的前提下产生的。这种文学史的“预设”恰好是另外一些学者“解构”的起点,在李杨看来,“如果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与惩罚’指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规定作家如何写和写什么,那么,80年代

针对文学的规训同样无所不在”^①。在李杨看来,因为“文学制度”和“政治无意识”的存在,即使是号称“纯文学”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也无处不有政治的影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于 80 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和叙述,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甄别,将有利于我们对本时期文学的深入理解。

为了解理解上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政治化”作一个简单的界定。“政治化”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解释,一个是作为“特殊历史建构物”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普遍的意识观念”,也就是詹姆逊所谓的“政治无意识”。实际上,说 80 年代文学的“去政治化”是就第一个意义而言的,在 80 年代,“政治”直接指向的是 1949 年以来由党制定和推行的文化方针和文艺生产体制,它的极端形态是“文革文学”体制。它涉及到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特殊的历史范畴,比如“两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突出”、“工农兵创作”、“高大全”、“文艺样板”等等。在对“去政治化”的理解上面,虽然 80 年代初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学界都在“改革”意识形态之下取得了“一致”,但是实际上两者的侧重点是非常不同的,官方意识形态更加强调的是“去文革化”,并把“文革”叙述为外在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畸形物,而文学界在 1985 年之后的发展却不仅仅是要“去文革化”,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去社会主义经验”了,不仅“文革”需要被反思和批判,1949 年以来的文艺方向和文艺机制都面临着“驱除”的命运,这样,两者之间的分裂就在所难免。

另外,我们应该把 80 年代的“去政治化”理解为一种“意图”和“趋向”,而不能理解为一种“结果”。实际上,即使是在具体的文学运行机制的层面上,80 年代的“去政治化”也是不彻底的,包括文学组织、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毛泽东时代的成规。以路遥的写作为例^②,他在 1985 年以后的写作就一直得到了这种文学体制的大力配合。

① 李杨:《重返 80 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 年第 1 期。

② 可参见拙文《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 1985 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 年第 6 期。

很明显,李杨虽然也谈到了“文学制度”,但是,他更多地从“政治化”的第二个意义,也就是“普遍的观念”来理解“政治化”的。在此前提下,任何一种文学都会与一种“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80年代的“去政治化”当然只能是从“一些人的政治”走向“另外一些人的政治”,从一种“意识形态”过渡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这其中甚至作出“新”与“旧”的区分都是很困难的,更谈不上“文学自主性”的确立。

非常遗憾的是,因为立论前提的不同,“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观点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就我个人而言,觉得要非常清楚地文学和政治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是非常困难的,在“去政治化”、“去社会主义化”,或者是“重新政治化”之间也谈不上有非常明确的区别,或许这种区别本身就是模糊的。如果以不损害80年代文学的问题意识和复杂性为前提,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搁置这种区别,保持一种“暧昧”的态度?或许这样更可以体现文学的特殊建构性。不过在近几年的一些文学论争中,文学的“泛政治化”又开始有抬头的趋向。比如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就有再次把“社会主义经验”神圣化的姿态,这其实是一种缺乏历史意识的简单判断,不仅不利于当下文学的建设,也不利于我们对80年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和当代历史的思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更愿意强调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乃至“去社会主义化”的积极意义,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言:“与政治游离的不是文学。由于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去破除那个影子……文学才成为文学。”^①

三 反思“进化论”

对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进化论”意识,比如几本文学史著作是这么描述的:“‘文革’后的文学风貌与‘文革’前比较,变化是很大的,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也是文学自身发

① [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第13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